南斯拉夫科學底衰落是鐵托集團 反人民政策的結果

日夫柯·嘉金

南斯拉夫人民，給世界科學也曾提供了不少的傑出的科學家——像十八世紀的博學者魯德熱爾·波斯柯維奇，他既是一個哲學家，又是一個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尼古拉·鐵斯拉是全世界著名的電學方面底發明家；約瑟夫·潘其奇曾有系統地創造了南斯拉夫的植物誌和動物誌底基礎；約溫·儒約維奇，則打下了研究南斯拉夫領土的地質學底始基；米海伊爾·彼得羅維奇，曾以自己的許多新著作，貢獻給數學科學的寶庫；而約溫·乞維伊奇則是地理形態學家和人文地理學家，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科學家。

國內最大的科學中心，是薩格勒布的南斯拉夫科學藝術學院（該院建立於1866年）、貝爾格萊德的塞爾布科學院（建立於1886年）和盧勃列那的科學藝術學院（建立於1939年）。這幾個學院內附有許多研究所和科學機構。

南斯拉夫最高學府主要的都集中在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和盧勃列那。貝爾格萊德大學，建立於1863年，其中有六個學院和許多個研究所。最老的科學機關是薩格勒布大學（該校創立於1669年）和盧勃列那大學（創立於1596年），這兩個大學包括很多學院和許多個從事科學研究的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南斯拉夫曾有頗大數量的科學機關和科學團體。但是，他們的活動在反動政府底嚴厲監察下受到極端的限制，這種監察，目的是要鎮壓進步思想和竭力阻礙民族科學的發展，特別是迫害所有對蘇聯科學感興趣的人們。然而南斯拉夫的進步科學社團却經常地去反對戰前南斯拉夫政府的反動政策，不僅保持了，並且還鞏固了同俄羅斯科學的傳統聯繫。

1945年，由於蘇軍戰勝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性的勝利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鬥爭的結果，在南斯拉夫科學面前，開闢了發展和繁榮的廣闊前途。

反人民的鐵托—蘭科維奇集團底叛變，使南斯拉夫科學與文化的發展成為不可能。鐵托匪幫出賣人民利益之後，南斯拉夫便成了美英帝國主義者們奴役的對象，在國內恢復了資本主義制度，使國家的經濟和科學屈服於軍備競賽。鐵托—蘭科維奇集團的法西斯制度，乃是那些爲了和平目的和爲了造福人民的真正科學事業底絆子手。

進步的科學家和教師們，從科學機關和高等學校中被驅逐出來，遭受着各種迫害並受極刑，因爲他們不能容忍鐵托集團的備戰、剝削勞動人民和蠻橫地掠奪南斯拉夫國家財富與天然資源的政策。

1949年，醫學院院長，著名的尼古拉·尼古里奇教授曾在薩拉也沃被逮捕，尼古里奇教授在戰爭期間曾挽救了很多游擊隊員的生命。在法西斯佔領南斯拉夫的初期，巴維里車分子曾把他投進亞塞諾瓦茨死囚營中。現在，因爲他曾在學生們面前斥責了貝爾格萊德統治者們底反蘇的叛變政策，鐵托分子又把他關在死囚營裏做苦工。在死囚營裏，尼古拉·尼古里奇就毫無踪跡地消失了。他們同樣也把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米爾柯·馬爾柯維奇關進集中營裏，因爲他曾在貝爾格萊德經濟學院的全體大會上勇敢地發表了保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利益的意見，並揭發了南斯拉夫目前統治者們的反人民行爲。鐵托分子，美英帝國主義者的忠實走狗們所需要的“科學家”，都是些贊

同他們的反人民政策的“科學家”，是在“理論上”贊同對國家和人民進行掠奪的“科學家”。因而他們把那些和科學絲毫沒有關係的、老奸巨猾的、反動的傢伙們擺在科學的領導崗位上。例如，狂熱的法西斯分子焦多爾·瓦里查科則被任為薩格勒布大學校長，這人曾在符次堡和來比錫希特勒的實驗室中受完了自己的生物學的“教育”，最初是在德國法西斯的“科學”刊物上投稿，而後來，照例又給美國反動的“科學”刊物撰稿。

很早以前，鐵托分子就剝奪了南斯拉夫的許多科學機關和大學的基本民主權利，而這些機關，甚至在戰前南斯拉夫最反動的統治下，在某種程度上，還會享有這種最基本的民主權利。目前不是由學術會議或科學院的主席團而是由YAB（蘭科維奇的特務機關）來授予學位；它們認為值得把學位給予一些人，絕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了科學成績。獲得院士榮譽稱號的，都是一些準備為反人民制度而服務的不學無術的人。無怪乎鐵托本人一下子就成為三個學院的“院士”——南斯拉夫所有學院的成員。

不久之前，法西斯統治者們命令其走狗——塞爾布科學院院長亞歷山大·別里奇通過三個法西斯分子——米蘭·包格達諾維奇、馬爾柯·車列包諾維奇和彼得·魯巴爾德為科學院的通訊院士。但是，科學家們卻以秘密投票方式否決了鐵托的候選人。當時，別里奇感到執行不了其主子們交給的任務，就瘋狂地要求根本取消學院內的秘密投票，而代之以公開投票方式，以便知道“什麼人和為什麼投反對票”。鐵托報章把這件事情作為藉口，開始迫害對鐵托分子投反對票的科學家們，稱他們為叛徒，並要求逮捕他們。

隨着美英帝國主義者們侵略行動的加強，賣國求榮的鐵托的宣傳分子和鐵托的偽科學家們對於進步的蘇聯科學的誣毀攻擊亦越來越賣力了。

鐵托法西斯分子，迫害着自由表達思想的任何行動，他們沒收了所有圖書館中的進步的科學書籍，首先是蘇聯出版的書籍。全國各高等學校的學生們，不得不按照講義大綱或已陳舊了的教科書來進行學習；他們所需要的書籍是沒有的。為數不多的圖書館，很快地就充滿了美國反動分子們的偽科學作品。

除此以外，鐵托世界主義者們還進行着不斷的、有系統的宣傳，瞎說所謂“南斯拉夫全部文化的落後性”以及必須採用美國偽科學、美國生活方式並把美國書籍輸入國內，以便儘速地消滅這種落後性。不久以前，在南斯拉夫的美國代理人，美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阿康，曾運給貝爾格萊德大學一批數十箱書籍的“贈品”。美國人“贈給”南斯拉夫的科學家和學生們的是些什麼書呢？是一些維廉·福格特所寫的書，他是一個在科學家假面具掩蓋之下的吃人生番，號召大量消除生殖機能 and 用野蠻的方法減少人口；是皮爾遜和哈爾彼爾——是以“拯救人類”為名而鼓吹仇視人類的理論的傢伙們的“著作”，他們主張地球上人口底最適宜數字為九億人，因而多於十億的“剩餘”人口，必須加以消滅，此外還有許多類似的極端反動的作品。

鐵托的“理論家們”力圖不落在其美國伙伴們的後面，企圖證明：南斯拉夫農民們的嚴重情況，是人口過剩的結果，而絕不是鐵托集團反人民政策的結果。例如，1952年3月間，鐵托法西斯的“先驅報”在“薩果里人口過剩”（薩果里在克羅地亞省）底標題下所發表的論文中斷言說：由於田地的收穫量和畜牧業的生產率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僅在瓦拉日金縣地區，就有15,000（在70,000人口中——作者）“剩餘”人口，應該以某種方法來消滅這些“剩餘”的人口。不久前，鐵托的“科學家們”甚至在報章上闡述說：南斯拉夫飢饉的原因，乃是“在農業生產中成為累贅的300萬農民”。貝爾格萊德的“10月20日報”，在“世界將愈來愈飢饉”一文中寫道：人類將有滅亡的危險，因為在最近5年內，世界糧食的生產只增長9%，而人口則增長了12%。

不難了解，鐵托分子們鼓吹馬爾薩斯學說是為了給他們在南斯拉夫所造成的這種悲慘境地找“理論”根據並進行辯護，是為給南斯拉夫的殖民地奴役進行辯護，是為給他們自己的罪惡政策——為美國壟斷資本家們的利益和為爭取遷移所謂“剩餘”人口所必需的“生活空間”而準備戰爭的罪惡政策進行辯護。

目前南斯拉夫各大學的教授會，正廣泛地在頌揚和鼓吹着魏斯曼—摩爾根“學說”和生物學上最反動的路綫。鐵托偽科學家們附和着這些為美

國遺傳學家們所提出的“問題”，如原子彈爆炸後，放射綫的發出，會影響人類和畜類發生遺傳的改變，如“毒氣突然變異的作用”等等，企圖由此煽起戰爭的狂熱。

鐵托集團的努力，是爲了使南斯拉夫科學軍國主義化，使南斯拉夫科學在罪惡的目的下從屬於新戰爭，使南斯拉夫科學變爲帝國主義底侵略武器。

國家法西斯化的和備戰的政策，美帝國主義者們對南斯拉夫的殖民地的奴役，以及鐵托集團對人民羣衆的野蠻掠奪和剝削，都有害地影響了南斯拉夫科學底發展，並完全排除了爲改善人民物質福利而實際運用科學的任何可能性。這一點，特別是在與南斯拉夫經濟的主要部門——農業，林業有密切聯繫的農業生物學的實例中，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由於大西洋集團國家方面對南斯拉夫糧食的需求，鐵托分子爲了貪圖購買武器的資金，就剝奪農民，從南斯拉夫運走大量的小麥和玉蜀黍，並逼迫農民，祇許他們種植這種作物。這在實際上引起了農業中的單種作物現象，也引起了土壤肥力的急劇下降。收成減少了三分之二。

反動的科學家們，用臭名昭彰的“土壤肥力遞減律”來非科學地證明和“論證”南斯拉夫農民的貧困和破產。他們把在達爾馬地亞、伊斯脫利亞和克羅地亞沿海地區的果木業和葡萄種植業的衰落，以及橄欖栽植收穫量的降低，解釋成爲“土壤的貧瘠”，而對波都那低地的穀類作物的低下收穫量，則忽而用乾旱，忽而用水災來解釋，到最後又忽而用近百年來氣候的變更來解釋。

爲了向大西洋集團國家輸出，鐵托分子還剝奪了農民所有飼養得很好的牲畜，因爲他們再沒有其他東西了，甚至把最好品種的牲畜也往國外推銷。

雖然鐵托分子對書報檢查很嚴格，但對他們的這些措施帶有憤怒情緒的報導，却仍常出現在刊物上。“先驅報”關於養畜專家們的不滿情緒敘述道：“無論如何不能認爲這種生意是無罪的”，因爲這種生意確給畜牧業以致命的打擊。

由於這種掠奪政策的結果，農民們沒有種子，沒有耕種能力，也就引起了播種面積的大大縮

減，土壤和播種質量的減低。在南斯拉夫總播種面積 720 萬公頃中，1951 年就有 300 萬餘公頃沒有播種。在整個邊境上的可耕地的廣大面積上，都長滿了野草，變成荒地。

果木業是南斯拉夫農業中最重要部門之一。戰前南斯拉夫水果的收穫量佔世界第八位，而梅子的收穫量則佔世界第一位。富農和投機分子對農村的奴役，沉重的土地的和果樹的租稅（每一棵果樹農民們在每年應納 500 地那的稅），使果木業遭到徹底破產。差不多所有的果園，都生滿了害蟲和病害。貧困的農民甚至無力保證果園的最基本的照料。他們只好忍氣吞聲地砍伐了果園，以便免除毫無利潤可得的每棵果樹的苛稅。

葡萄園底面積亦顯著地縮減。橄欖栽植業——沿亞得里亞海一帶居民，以數世紀的時間所培養出來的農業中最早的一個部門——亦正在衰落。目前橄欖油的生產量，相當於威尼斯統治時期，即拿破崙戰爭之前橄欖生產的全部的 $\frac{1}{4}$ 。幾乎全部橄欖種植都被橄欖蚊和其他害蟲所破壞，而在收穫前還要跌碎 50% 以上，再沒有歉收到如此情形的了。

在法西斯統治集團領導南斯拉夫農業的情況之下，還能談到什麼科學幫助農業，談到什麼把農業生物學的成就應用到實踐上呢！

甚至鐵托的報章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薩格勒布果木業研究所的科學工作者奧托·波胡金斯基在“先驅報”上寫道：“都無須去想了，既不會有任何農業技術措施的實行，亦不會有新的培植基礎。”“我們的果木業正在衰落，這是事實，——波胡金斯基灰心地指出。——在現存的制度下，什麼時候和在什麼程度上能够防止這種衰落，這是誰也沒有信心預言的事……我們應承認這些事實，即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可能做到什麼，頂多……能够稍緩一下還苟延着的果木業的死亡。”薩格勒布大學農業系講師 H·雪爾曼寫道：“戰後我國水果的數量和質量都不斷地降低，……並蔓延着加利福尼亞蚜蟲和其他害蟲，……防治害蟲的機器和工具都很缺乏，……我國人民眼看着自己果園在衰落，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源泉在消逝着。”

爲了討論畜牧業所處的慘重境地，1951 年 12 月間，在薩格勒布曾舉行了克羅地亞科學家和

養畜專家們的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改善畜牧業的措施”。鐵托偽科學家們爲了使自己的會議有一點兒“科學”的樣子，提出了一些顯然在完全破壞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建議，例如：必須“改善牧場”，“實行改良土壤和草地石灰化”，“施行飼料作物輪種制”等。但所有的主張在總結中都同樣地歸結爲：在科學基礎上改善畜牧業，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因爲當局剝奪農民並輸出最優良的牲畜，而剩下的牲畜則得不到飼料。“假如我們不飼養牲畜，那末我們就是在徒勞無益地從事選種，……徒勞無益地從事人工播種，徒勞無益地談論動物飼養技術。”——這是農業總局牧畜業研究所所長魯多·烏金那博士說的話。薩格勒布大學農業系教授霍爾瓦德·布蘭柯和奧格雷捷科在會上引證了畜牧業完全衰落的令人信服的事實。當時，順服於鐵托政權的偽科學家們，企圖把法西斯制度的過錯，推到農民身上，妄談這是農民本身的過錯。

南斯拉夫底豐富的森林地帶，遭到蠻橫的摧殘。鐵托分子爲了輸出木料來換取軍火，把森林完全砍光。

由於克羅地亞北部碧洛山和帕布科等山的山坡上一片光禿的結果，1951年夏天，在多次暴雨之後，發生了慘重的水災，這次水災沖毀了沙夫河以北克羅地亞的肥沃平原，毀壞了全部莊稼，破壞了鄉村，並斷送了牲畜。

最近，鐵托分子開始從薩拉也沃城大力推銷某個阿法那西也夫的關於植林方面的著作，他們把他的“著作”印行了很多版。鐵托的宣傳機關，向全科學界和各國的科學組織，特別是向森林學家們報導並盼望都能知道阿法那西也夫的著作。圍繞着阿法那西也夫的“著作”的叫囂，無非是要想緩和由森林地區的毀壞引起的憤怒的南斯拉夫的社會輿論。按阿法那西也夫的“方法”，據說伐盡百齡以上的大樹後，經過6—10年的時間，就能夠重新培植出有價值的森林。阿法那西也夫提出了培植“急速林”的荒謬“理論”，這一“理論”是以利用類似紅松和桉樹的速長的亞熱帶品種爲基礎的，並斷言說，他已發現了一種方法，藉助於這種方法，能夠很快地使這些樹適應於波斯尼亞山，該山冬季嚴寒常常達到零下30度。鐵托的“學術名人”一筆“抹殺”了米丘林關於培養新有機體的

學說，並宣稱米丘林方法爲“陳舊了的方法。”

另外一個鐵托“專家”名叫什麼伊沃·布拉烏特，在他自己的以“永久林”爲題的文章中（該文發表在1952年2月“先驅報”上）向讀者肯定地說：無論砍掉多少樹，南斯拉夫的森林也是不可能消滅的。“森林自己能保護自己，森林本身能恢復起來……只有比電鋸場、斧頭和鐵路所砍伐運走的還多！”——布拉烏特就是這樣地在叫喊着。

正是這種準備替鐵托分子的任何罪行進行辯護的騙子們，乃是今天南斯拉夫的僅有的大有成績的“科學家”。

在醫學和人民保健事業方面的情形更壞。根據鐵托刊物上所承認的，南斯拉夫有許多縣份竟沒有一個醫生。在馬其頓三萬居民中只有一個醫生，而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農業地區四萬居民中也只有一個醫生。南斯拉夫1600萬居民中，每年有10萬人死於結核病。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被檢查的50萬人中，有34,000人患有梅毒。而15,000人則患有顆粒性結膜炎。在馬其頓、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車爾諾哥利亞和達爾馬地亞的整個區域流行着腸室扶斯、斑疹傷寒、赤痢以及其他病症。法西斯報紙“新馬其頓報”也承認說，由於醫生的缺乏，一時還不可能在馬其頓全部地區進行反傳染病的鬥爭，並且由於同一原因，將只能對那些“帶有危險性”的疾病進行鬥爭。在飢饉的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先驅報”却嘲弄似地叫囂說：“人民營養研究所已進行了更廣泛的研究工作。”

鐵托政府一年年地減少對各個科學機關和高等學校的工作的撥款。

當1952年國家預算的77%用在軍事準備的同時，用在教育、文化和科學上的撥款，却一共只佔全預算的0.7%。

1952年，鐵托分子減少了高等醫科學校學生的入學名額達50%以上，並停止給學生們獎學金。

正像1952年6月30日的“大學先驅報”上所承認的一樣：塞爾布科學院的研究工作正顯著地在緊縮。該院沒有供研究所用的房屋和即使是設備貧乏的實驗室。科學院的中央圖書館已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因爲當局奪去了它的辦公地點。

貝爾格萊德高等技術學校的物理學系，甚至

沒有可能訂閱一些科學雜誌。在這個系裏，學生們的實習材料已被縮減，上實驗室課的鐘點已縮減到最小限度。類似的情況，在其他的系內也存在着。自然科學—數學院由於供實驗室用的房屋十分缺乏，因而礦物學、地質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等班的學生們無法進行實習。

在南斯拉夫，無論是儀器、藥品和標本以及重要的科學工作所需要的科學書籍，幾乎樣樣都是得不到的。

貝爾格萊德大學教授B.M. 米丘維奇在“大學先驅報”上寫道：在化學部門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化學研究所沒有壓熱器和普通的離心器……。

學生們不得不自己出錢去買實習用的極簡單的用具。在狹小的、設備很壞的實驗室裏，每間房間平均有120個學生在工作着。實驗室不能通新鮮空氣，並經常地充滿了污濁的空氣。室內沒有電扇和通風設備，因此，常常發生學生中毒和生病的事件。例如，自1951至1952年一個學年中間，一班250名學生中，生病或因不能忍受實驗室的不利條件而停止了實習的就有210人。

學生們使用的教科書，都是已陳舊了幾十年的。大部分教科書和科學著作，都是些對現代科學成就和對有關當前問題的科學書籍完全不熟悉的人寫的。拿附有插圖的貝爾格萊德“科學書籍”出版局出版的“臨床實習”一書來說，就是什麼醫學教授安吉奇·吉米得利和波利奇·都山所寫的。關於這本書，在“大學先驅報”上發表文章的評閱者寫道，使人發生了一種“好像某些物理學家迫不得已才寫了婦科醫學教科書”的印象。作者並沒有瞭解他們所寫的許多東西，在概念和標記上，存在着空前未有的混亂現象：他們把化學名詞同藥物名詞混為一談，結果正像評閱者所說的，是真正的雜拌。敢於不遵從這種教科書的學生們，據評閱者的意見，在考試時準不會獲得比1分再多的分數。評閱者引證了一系列令人憤怒的荒謬事件，證明了作者的徹頭徹尾的不學無術。

西尼沙·斯坦柯維奇在塞爾布生物學會的會議上講道：最近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只有言辭的（即口頭的）性質，因為不可能在實踐中去告訴學生們。

塞爾布科學院院士畢里蒙維奇在大學教職員協會內發表意見時，談到了南斯拉夫所有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中的危機。他認為這種危機的實質，是在於教師們和他們所教的講義照例有很多是落後於現代科學成就的。教授和教師們每年教條式地講授着那些很早以前就記熟了的原理，脫離了研究工作，他們不了解科學界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薩格勒布自然科學—數學院助教艾岡·馬鐵也維奇，在薩格勒布的“先驅報”上寫道：在高等學校中完全沒有進行研究工作。有時，某些助教只單獨地研究一些對誰都不需要的“問題”，遠遠地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科學的現代成就。

南斯拉夫大學和專科學校中，既沒有研究生，也沒有設立研究部。

在鐵托南斯拉夫，絕大多數的大學生沒有可能受完自己的教育。聽完了課程，但是沒有可能通過畢業考試或獲得畢業證書的大學生，在1951年約有15,000名。祇在貝爾格萊德大學一個學校中，就有四千多名這樣的大學生，其中已“唸了”3年至6年。1951年至1952年一個學年期間，就有38%的學生被淘汰了。這樣高的大學生受淘汰的百分比在南斯拉夫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貝爾格萊德的統治者們，儘全力以法西斯思想，以反動的蒙昧主義者—世界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摩爾根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其他許多思想奴僕們的“理論”精神來教育青年學生。近年來，又把大量的軍事課目列入高等學校的教學計劃內。

南斯拉夫的學生們，愈益堅決地進行着反對科學上的鐵托的走狗、反對鼓吹帝國主義的蒙昧主義思想的法西斯教師們底鬥爭，來回答這種使科學法西斯化的政策。

1951年秋，薩格勒布大學工學院的學生們，堅持了一個多月的罷課，並組織多次的遊行示威，以反對大學教學的法西斯方法。他們要求開除反動的教師。學校當局無力擊破學生們的團結一致，他們在學生們的團結和果敢面前，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讓步。他們礙於學生們的行動，決定把全部責任推到其走狗之一——蒙昧主義者庫

〔下接46頁〕